第54卷 第5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4, No. 5
2017年9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p. 2017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理论主题

孙熙国[1] 张 莉[2]

(1.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公共教学部,北京 100191)

摘 要: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是随着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转换而转换。但不管如何变化和转换,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题都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这是马克思“始终如一”的目标。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一生研究的这一目标从未出现根本性的 “改道”“转移”或“中断”,因而,也就谈不上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向早年思想的“回归”。马克思晚年所做的人类学笔记及相关研究不是出于“考古”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创立一门不同于前人的人类学,也不仅仅是为了探索俄国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是单纯从理论层面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而是通过对古代社会和人类早期生活与实践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完善、发展和深化他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时代问题与时代任务的认识,寻找解决这一时代问题、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根本方法和现实路径。

关键词: 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思想主题;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K 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5-0025-11

本文所讨论的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是指马克思对马·柯瓦列夫斯基、路易斯·亨·摩尔根、约·拉伯克、亨利·萨姆纳·梅恩和约·布·菲尔等人类学家相关研究成果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是马克思“极其丰富的理论遗产中被研究得最少的部分”。①近年来关于这些笔记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困惑学界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如马克思为什么中断了《资本论》的写作,转而研究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极为遥远的原始社会?马克思研究原始部族与农村公社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些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它与马克思此前的研究是什么关系?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晚年学术研究“转向”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会转向“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概括地说学界有四种解读。

一是“中断论”的解读。“中断论”把马克思晚年和此前的理论研究完全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放弃了原来的理论兴趣,从而中断了《资本论》的写作。卡尔·考茨基就此指出:“马克思完全沉浸在现实和未来的斗争之中,他一心一意想着的是,哪些是他要说的话,而不关心那些他已经说过的话……马克思根本不可能专门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他以前的文章上面。”②凯利认为,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开始对人文科学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发动新的进攻”③,正因

收稿日期:2017-06-10

作者简介:孙熙国,男,山东安丘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对象与理论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3AK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第229页。

② 转引自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③ 凯利·唐纳德:《晚年马克思和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2页。

为被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所吸引,马克思才没有完成(在凯利看来,也许马克思本来就没有打算)他的《资本论》的写作。

二是“转移论”的解读。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实现了学术阵地的转移。至于怎样转移、转移到哪里,则见仁见智。或认为马克思将学术研究阵地转移到古代社会,或认为转移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命运,或认为转移到人类学领域。美国学者莱文(又译列文)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公社”》中认为,“马克思的读书笔记表明,自 1853 年起,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开始减退了。为了研究社会,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人类学,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① 苏联学者安德烈也夫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杂记手稿》中指出,晚年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是马克思一生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界标,它表明马克思的科学兴趣转向对原始社会结构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这些机制遭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摧残和破坏,以及对创立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过程前景的研究。② 国内学者张奎良则指出,晚年马克思的“炽热革命热情和殷切的革命期待在现实生活中都无情地化为泡影了”;“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灌注他毕生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转而去从事陌生的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研究”。③

三是“回归论”的解读。与国内学者不同,一些西方学者把晚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和他成熟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晚年对自己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发生了动摇,于是便“重新捡起了青年时代所关怀的问题:对自然状态的人和文明条件下的人的批判”④,并试图加以修正,从而回归到了早年的哲学人本学思想。因此,马克思晚年实际上否定了他成熟时期的思想,实现了向早年思想的回归。而这一回归的契机就是马克思关注到人类学前沿研究成果。“人类学作为马克思自我辩证革新的最后阶段,使他的理论与其后继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同。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马克思是他本人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也不为过。”⑤这就是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回归论”解读。这一解读的实质就是先把马克思早年的思想归结为哲学人本主义,然后制造早年和中年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从而从根本上推倒和颠覆唯物史观。

四是“继续论”的解读。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在 1872 年底给丹尼逊的信中的说法以及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谈到的相关内容,推断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是为完成《资本论》服务的。费多谢耶夫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有时是同解决《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问题紧密相连,这表明他想制定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阐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有时这项研究工作也是与此无关的。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发展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⑥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兴起为马克思进一步证明和完善唯物史观提供了可能,这才是他晚年研究人类学的主因。马克思自 1873 年后“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完善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的学说体系加固科学基础”。⑦ 马克思写作“笔记”不仅为了证明和完善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在于创造性地发展唯物史观,特别是对以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的某些传统观点的超越。贺麟在 1986 年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上指出,马克思《摘要》

---

① 转引自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78 页。
② 转引自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82 页。
③ 张奎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 年 5 月 29 日。
④ 转引自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76 页。
⑤ Kelley,D. R,“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An Essay on the Very Old Marx”,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 45,No. 2:262.
⑥ 彼·费多谢耶夫等:《卡尔·马克思》,北京: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705 页。
⑦ 转引自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72 页。

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补充和完善,因为它通过对生产技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发展过程的分析,说明了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必然性。① 冯景源则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个“艺术整体”,马克思晚年探索人类历史的目的在于挖掘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历史的钥匙”,也就是唯物史观。②

以上我们对学界诸家的看法作了谨慎的转述。但问题是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兴趣为什么会聚焦到人类学上?我们的回答是,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答。马克思的理论也不例外。他一生的理论研究都是随着他那个时代的实践和问题的转换而转换,但不管如何转换,马克思所要解决的时代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这是马克思“始终如一”的大目标。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研究的这一目标从未改变,也未出现根本性的“中断”“改道”和“转移”,因而,也就谈不上向早年的“回归”。从马克思一生理论研究的这一目标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不是出于考古的兴趣,不是为了创立一门不同于前人的人类学,也不仅仅是为了探索俄国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是单纯从理论层面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而是通过对古代社会和人类早期生活与实践状况的分析、考察和研究,完善、发展和深化他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时代问题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寻找解决这一时代问题、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基本方法和现实路径。那么,怎样才能回答这一问题、完成这一任务呢?怎样才能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呢?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做了概括:第一,劳动者必须认识自然界的本质,把握自然界的规律,摆脱自然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实现经济解放;第二,劳动者必须认识社会的本质,把握社会的规律,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政治解放;第三,劳动者必须认识思维和精神的本质,把握认识的规律,摆脱自己对自己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③,实现思想解放、精神解放。恩格斯在 1880 年初做出的这三点概括,在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都得到了体现。以下我们分而论之。

二、马克思晚年对经济解放的探索

诚如列宁所言,承认物质世界的先在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自然观也不能例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世界同旧唯物主义相比,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和直观性,形成了现实世界的理论。旧唯物主义眼中的世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④,或者说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的世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⑤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标出发,提出了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现实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根本特点有二:一是从实践出发理解周围的世界,从而拒斥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的自然界;二是从主体出发理解周围的世界,从而拒斥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自然界。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⑥ 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和以往旧唯物主义的不同。

---

① 贺麟:《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 年第 4 期,第 11 页。
② 冯景源:《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意义——打开马克思晚年困惑的钥匙》,《人文杂志》1995 年第 1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4 页。

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地去建构现实世界的理论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实的世界是进到了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领域并为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世界，“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① 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以人类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为前提，人越是认识和把握了自然界，人的自由程度就会越高，人也就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反过来说，人越是自由，也就越是把握了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实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也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②。因此，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理解周围的世界，提出现实世界的理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物质世界中获取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实现经济解放，让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为了说明上述思想，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对财富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论述，阐明了财富对于确证和实现人的本质的意义。摩尔根曾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③财富固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马克思通过古代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考察，揭示了历史上财富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实现的重大意义。

一方面，社会财富作为人的劳动实践的结果，反映和确证了人的实践本质和人的主体地位。在财富的来源问题上，马克思赞成并多次引用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晚年，马克思根据古代《摩奴法典》所记录的“财产是通过耕种公社荒地而产生的”和 1849 年至 1851 年旁遮普施政报告中说到的“清除土地上的林莽，常常被认为是财产权的最有力的、无可反驳的证据”④，断定劳动是财富的基础和源泉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也是被承认的。这一观点对于打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幻象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作为财富的一般抽象与衡量尺度的货币符号被直接看作财富本身，资本也因其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对其他要素的统摄作用而被当成财富运转的支配者、甚至是财富创造的动力源。资本主义对商品、财富、资本关系的误读湮没了劳动实践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但是，当我们回溯人类古代历史时，就会清晰地看到：劳动者所花费的劳动是较为平等、公平地分配与划分财产的依据，劳动能力与生存技术是生活资料丰富的条件，劳动工具与生产技术的发明是人类社会阶段性飞跃的标志。

另一方面，人在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中，人的集体、公有属性和社会本质得到进一步确证和实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⑤马克思《资本论》揭示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在物的掩盖之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财富的本质不是物，而是在物掩盖之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公有和集体现象是人类童年的自然追求。个体能力的局限、劳动工具的简陋、生活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9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7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4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5—306 页。

境的恶劣等,决定了每一个体对集体和公有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所摘录的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中的话:“财产的最古老形式是财产共有制。因为他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没有协作是不行的;他们只有靠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向自然界争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产品本身作为共同产品都是群的财产)。”①我国研究摩梭母系制的专家严汝娴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调查中发现,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的永宁地区的摩梭百姓,尚可每户分到猪膘肉,其渡过难关的法宝就是公有制。以益秸亲族为例,其财产归亲族集体所有,世代集体相承。平时由“达布”支配,家人参加生产劳动,农具、牲畜各取所需。粮食、蔬菜、衣物、农具和纺织工具等,都分别存放于各类公共仓库中,食品是平均分配共同消费。当然有时可能会给老人、病人和小孩多分配一些有营养的食品。② 不论在平时还是困难时期,人们的物质需求乃至精神需求几乎全部寄托于集体,集体也会回馈给人们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更加丰厚的资源储备、更加和谐的精神力量。

但是,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也能损害和摧残人的本质。在古代社会中,生产是为人服务的,生产和财富的目的都是为了人,都要落脚于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与此相反,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完全被颠倒了,生产和财富成了人的目的,人则要为生产和财富服务,这就是财富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③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异化归根结底是由私有制推动的,“其间带决定意义的实质内容是土地私人占有制;其他社会存在形式、法制、宗教等等全是它的衍生。土地私人占有制是私有财产、私有制的标志;对私有财产、私有制的研究是人类学笔记的核心,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最大成果。”④正是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走向了确证和实现人的本质的反面。因此,要想实现人的解放,人类就必须扬弃私有制,在更高层面上进到公有制社会。

可见,晚年马克思考察古代社会的生活和实践,不是要求我们回到原始社会。马克思本人也说过,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⑤ 晚年马克思考察古代社会的生活和实践的目的是通过对财富,尤其是集体财富的历史形态与历史意义的研究,说明集体财富的创造与公有制的实行,既是适合人类本性的原初方式,也是未来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对比马克思前后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发现,早年马克思主要侧重于逻辑推理,将印度和俄国等地的农村公社视为原始公有制的遗存并推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公社土地公有制;晚年马克思则充分利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对原始社会史和农村公社进行研究,使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定义的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组织联系起来,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集体财富与私有财产、氏族内部利益冲突与殖民侵略、劳动分工与异化等历史现象与历史过程,科学揭示了早期人类社会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演变。克拉德曾指出,马克思“把人同自然地实际脱离以及复归统一的潜在可能性,第一次作为一种哲学学说提了出来”。⑥ 如果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以“形上”和“思辨”的方式对这一学说进行了阐释和探索,那么,晚年“人类学笔记”则是以相对“形下”的方式对这一学说的回应、丰富和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10 页。
② 严汝娴,刘小幸:《摩梭母系制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4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6 页。
④ 韩学本:《历史的余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9 页。
⑥ 劳伦斯·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 年第 1 期,第 191 页。

三、马克思晚年对政治解放的探索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把个人与群体的对立推向了极致的社会,那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实现了个体与群体高度统一的社会,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的社会。① 但是,人作为社会主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不是毫无缘由的,而是从古代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相统一的原始状态中发展而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由最初的对共同体的完全从属地位和原始的自由平等状况,逐步演变为个人与原始共同体的分离乃至出现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同个人完全对立的共同体就是虚假的共同体)。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这一现象的克服和消灭,只有当社会进入到“自由人联合体”,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得以实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尤其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即体现了上述思想和逻辑。摩尔根所开启的氏族理论及其在人类学理论方面的重大发现,极大地帮助和启发了马克思去追溯和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梳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私有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展望未来人类社会的现实图景。马克思的笔记阐述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原则,展现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原初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揭示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一部分人剥削一部分人的历史状况的形成。

第一,民主是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氏族社会的民主原则源于氏族内部的血缘亲属原则和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氏族公社成员之间以及代际之间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彼此有相互援助和保护的义务。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全体成员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个人离开了这个整体便无法生存。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君主政体是与氏族制度不相容的”。③ 这段话,论证民主是古代社会组织的本质原则,并提出了与摩尔根相似的看法。针对乔治·吉布斯在给摩尔根的信中将“等级”概念引入并用来描述古代社会,马克思说道:“这样哪里有氏族之间的等级之分”,“血缘纽带不容产生任何形式完备的贵族;兄弟关系继续存在于平等感中”;如果氏族内部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等级”④,而氏族也就不再成为氏族了。针对梅恩认为原始社会使人处于专制的羁绊中的看法,马克思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不是专制的,而是令人满意和愉快的。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还补充说道:当人受野蛮的风俗习惯奴役的时候,说他在文明状态中是自由的,这是不对的。作为文明状态的产物的民法与民权自由,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民法与民权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并不含有自由的任何实质性内容。不仅氏族这种组织单位本质上是民主的,而且,在此基础上逐级形成的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乃至整个氏族社会也是民主的。这是氏族社会内部的人民选举、酋长全体会议等组织形式和社会职能所展现出来的经验事实。正如摩尔根所说:“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精神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民主原则乃是氏族社会的基本要素”。⑤

可见,民主是存在于古代社会中的普遍性和本质性原则。建立在这一原则和基础之上的管理运行机制能够较好地解决氏族社会内部的冲突,较好地协调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甚至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第二,民主原则的破坏与压迫机构的产生。

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个人与社会原始统一基础上的民主原则是如何丧失的呢?起初,氏族首领和议事机构只有社会管理职能,在地位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3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71 页。
⑤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139 页。

与民众平等;首领的推选也主要基于能力和美德。但是,当酋长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就希望保持个人及其后代的世袭地位。一旦世袭制建立,财产与权力便建成牢固联盟。首领的推选不再基于民主原则和品格能力,在世袭制实行过程中,就出现了如下情况:要么就是如科瓦列夫斯基所指出的“外来征服者部落的由选举产生的首领,逐渐变成了世袭的全民族——僧侣——最高领袖”①;要么就是本土首领的后代当选,如卢梭谈到的:“人们宁愿冒着由婴儿、怪人或傻瓜来当首领的危险,也不愿意为了选择好的国王而发生纠纷。”②权力与财产的结合使氏族机关蜕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机构。一方面,财富为权力打下基础。爱尔兰的布雷亨法表明,首领首先是富人。一旦有人获得财富,就打开了走向首领地位的道路。正像梅恩所指出的:在当时,“金钱贵族与血缘贵族很快就融为一体”,而“出身与财富对立,特别是与非地产的对立,完全是现代的事情”。③ 因为财富问题,首领与民众的冲突大大加剧。正如马克思所说,“氏族酋长等人由于财富等等已经和氏族的群众处于内部冲突之中”。④另一方面,权力也为财富打下基础。根据《约·布·菲尔〈印度与锡兰的雅利安人公社〉一书摘要》的描述,在锡兰众多的划归个人或家庭的世袭地当中,“最主要的那一块或一份田——叫作摩特图瓦,属于村社首领;所有其他的份地占有者都得向此人缴纳某种实物贡赋或为他服某种有明确规定的徭役:干家务或干农活”。⑤ 氏族部落的酋长们越来越意识到权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此,为了得到君主赋予的权力,他们甘愿成为他们统治、剥削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制度逐渐由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沦为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

可见,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古老氏族共同体的瓦解,个人与社会日趋分离,氏族社会的民主原则和管理模式逐步式微并走向崩溃,人在权力、利益、功名面前全面异化,基于个人与社会相统一基础之上的民主原则便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便思考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会成为什么样子? 既然私有制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民主原则的破坏,因此,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和确立真正的民主原则,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晚年笔记这一方面的研究实现了多方面突破。第一,继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予以更正之后,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进一步论证了氏族在家庭、社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起始地位,认识到人类政治组织的源头和基础是氏族,并考察了对后来人类政治制度演化起深远影响的原始政治生活中的“优良基因”——民主、平等、友爱、互助等。马克思晚年所做的这一工作既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发展和完善,也是他严谨的科学精神的彰显。第二,在晚年笔记以前马克思对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私有制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的框架下展开的,而对私有制之前的政治状况的考察则付之阙如了。晚年笔记考察和研究了史前阶段个人与共同体的原初关系及其流变,弥补了马克思此前研究的空白。第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人民主权、人民国家、人民民主等政治解放的构想,在母系家庭、氏族公社、部落联盟、酋长会议那里找到了原初的践行方式和实现路径。

总之,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关于政治解放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为未来社会打破虚幻共同体的钳制、重建个人与社会、人民和国家的统一提供了重要参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15 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86—58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7 页。

⑤ 马克思:《约·布·菲尔〈印度与锡兰的雅利安人公社〉一书摘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 年第 3 辑,第 3—4 页。

四、马克思晚年对精神解放的探索

柯林武德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在思考和认识人类社会时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只“选择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是政治,在马克思是经济”。① 其实,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三位一体的解放,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内在地包含了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一重要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晚年笔记中不仅考察了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的路径和内容,也通过考察原始道德和宗教等精神现象的产生及其内容,追溯产生这些宗教现象的世俗基础,探讨人类改变世俗状况、克服思想异化、实现精神解放的现实路径。

第一,原始社会的精神生活及其主要内容。

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精神生活状况归根到底来自人的生活和实践活动。对原始人而言,最为重要的生活和实践活动领域,一是生产劳动,二是家庭生活,三是政治生活。这些领域体现着原始人的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内容。

在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领域,原始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公有观念和协作意识。因为“活下来”是原始人的第一法则,由此人们意识到人人平等、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正如摩尔根所说:“共产制生活方式看来是起源于血缘家庭的需要,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继续存在,而在美洲土著中继续存在于对偶制家庭中,一直实行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马克思在此补充道:“而南方斯拉夫人呢?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罗斯人呢?”②他以反问的方式说明了原始人公有观念和共产制生活方式在原始社会的普遍性。与原始公有原则紧密相连的是互助协作精神,即在“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下氏族成员有相互援助和相互保护的义务。这一原则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以至于“在动产个人化的过程完成后的许多世纪,仍然表现在这样一种权利上,即贫困的家庭可以向富裕的邻人要求强制性的帮助”。③ 马克思的笔记中还显示,《秘鲁王室纪略》中也谈到这样一种情况:“当普通人结婚时,全公社(= 氏族)的人都要有义务为他们建造、安排住宅。”④

在家庭生活中,原始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婚姻的自由和对后代的责任心、爱心。婚姻存续期间,体现在女方身上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约束表现得尤为明显。“丈夫用严厉的惩罚要求妻子保持贞操,而他自身却无此义务”,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⑤ 摩尔根评价说:“不管存在着什么样的专偶婚制,都不过是通过强力压迫妇女来实行的(某种程度的幽禁生活)。”⑥马克思则在“通过强力压制妇女”这句话下面划出着重线。但这一时期人的离婚是自由的,婚姻关系的维持取决于夫妻双方是否两情相悦。马克思记录道:“离婚最初就是根据夫妇双方意愿进行的(这或许是从对偶制家庭时期传下来的)。”⑦可以说,这是原始婚姻遵循的基本规范,也是原始家庭伦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离婚极为自由,致使一夫一妻制在原始人那里显得较为“脆质”。但因“生育子女有助于婚姻关系的巩固和长久”⑧,便生发出原始家庭伦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对后代的责任和爱心。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孩子在古代社会中所受到的疼爱和优待甚至比现代人的还要好。这一时期人们对孩子的爱心

---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5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0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1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1、36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7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7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60 页。

可能已经到了无原则的程度,人类学家路威甚至得出结论:“文化程度的简陋和儿童待遇的和善之间几乎成正比例。”①

在政治生活方面,原始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氏族内部的权利平等、人身自由和民主性原则。摩尔根以易洛魁人塞讷卡部落的八个氏族为样本,说明了氏族社会的组织状况及其习俗原则。马克思重点标记了“易洛魁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人身自由的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特有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一律平等”。② 这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意味着领导者与一般成员的民主关系。酋长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他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他的领导作用的实现是靠他的勤劳、勇敢、智慧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示范作用及组织才能。他为群众办事,必须竭尽全力;必须像父母关怀子女一样关心他的氏族成员。因此,“酋长在群众心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群众自觉自愿地服从他的领导”。③ 可见,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有其坚实的道德根基,其核心是民主。

通过对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生产劳动、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④ 原始人所遵循的这些根本原则和集体主义、公有观念、协作意识等,是原始社会生活和实践发展的产物。这种基于个性与共性的同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基础上的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道德,对调解当时的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人类反思和纠正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的种种冲突和对立提供了蓝本。

第二,精神生活的异化与精神解放的实现。

蒙昧时期,人们“占有的对象很少,没有占有欲;没有现在这样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心灵的 studium lucre{贪欲}”;⑤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财产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唤醒人的性格中的新的因素;……最古老和较古老习俗都无法抵抗它”。⑥ 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道德、宗教等精神现象原本是人的创造物,现在又反过来成为一部分人奴役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思想工具。青年黑格尔派较早地把这一现象称为“观念异化”,并发誓帮助人们摆脱“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⑦ 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局限于纯粹思想领域的斗争,只是一种针对“副本”的斗争,因而是“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是“自以为是狼”而实际上是只会发出“咩咩叫声”的虚弱的“绵羊”的徒劳呼唤。⑧ 因为道德宗教等精神现象之所以能够奴役和压迫人,真正的原因不在道德宗教等精神生活本身,而在于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⑨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正是循此思路探讨了实现人类精神解放的路径。

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形式中,宗教是观念异化的“极端的形式”。⑩ 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对宗教产生原因和消灭路径

---

① 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4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16 页。
③ 王永祥、李德良、徐吉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1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80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92—393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9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9—510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 页。
⑩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93 页。

的思考,说明了人类走向精神解放的现实路径。从根本上说,宗教产生于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水平和能力的低下,是人类受到必然王国限制和奴役的结果。“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 马克思把宗教神学等精神现象问题归结为世俗问题,从世俗的经济政治事实出发、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宗教,这样就把“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 马克思晚年笔记就展现了宗教在古代社会的在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统治功能。在他看来,宗教对人们的束缚体现于以下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原始民族本土宗教的欺骗与奴役,即“婆罗门”和“宗教的法学家”之流利用宗教向人们索要赠物、鼓励分家、规定自由布施的权利,从而收敛钱财、愚弄大众;甚至通过宗教偶像的“妙用”将人们对神的崇拜引导为对统治者的崇拜,从而奴役人民服从政治统治。另一条线索是外来殖民者及基督教的欺骗与奴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科瓦列夫斯基原作中的“穆斯林法律及其在印度土地关系的领域中所作的改变”摘录时改为“穆斯林法律及其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所作的改变”。③ 显然,后者比前者在表达上更强调出宗教的作用对象及其影响的直接性。这一改动是有意为之还是意外疏漏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反映出马克思关注的重点在于宗教的欺骗性对殖民地的不良影响。马克思所摘录的这一节内容描绘了印第安人和印度民众因西班牙人的入侵而受到更加沉重的精神束缚与经济盘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援引基督教专业研究人员威·豪尹特的话对基督教殖民制度予以同样严厉的批判——“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④

由此可见,宗教等精神现象对人的奴役说到底是经济和政治状况对人的奴役,因此,摆脱精神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精神解放就必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里,经济解放是精神解放的物质前提,精神解放是经济解放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⑤

有些学者认为,单就宗教问题来说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不再单纯地否定宗教,而是较为理性地对宗教的起源与历史地位予以评价。但是,透过上面的论述和疏解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对宗教所持有的鲜明立场和批判态度,同他早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并在后来一系列著作的论述中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完全一致。诚如米丁所说,“马克思主义承认精神生活的意义,可是同时强调指出,精神的东西的基础是客观的、物质的存在”⑥,从而科学探索了人的精神发展与精神解放的真实前景和历史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一样,精神解放同样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内容。一句话,实现无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66—6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26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2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6—97 页。
⑥ M. b. 米丁:《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 26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7—68 页。

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贯穿包括晚年笔记在内的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著述的主题。

结　语

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家,就在于他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完成了时代的任务。但并非任何思想家都存在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的思想家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对于这一类型的思想家就需要研究者去寻觅、探索其思想产生、转变和发展的历程,对比其前后迥然有别的思想性质。也有一些思想家在其一生的学术历程中只是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推进自己的思想,而不会推翻自己先前的思想。马克思就属于后者。正如他在《自白》中回答他女儿“你的特点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说:“目标始终如一。”① 因为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历程所围绕着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内容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让劳动者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以及“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从而实现人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因此,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不能在概念称谓上兜圈子,无论是苏联学者把马克思晚年笔记归结为“古代史笔记”,还是从西方学者克拉德那里流传开来的从人类学角度定义的“民族学笔记”,抑或是国内有些学者所提出和阐发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都在不同程度上遮蔽和偏离了晚年马克思笔记的理论主题和实践指归——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

Karl Marx's Ideological Theme of "Anthropological Notes" in His Later Years

Sun Xiguo[1], Zhang Li[2]

(1.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s theoretical research changed alongside with the shift of the issues and tasks of his times. No matter how the issues and tasks changed, the theme of his theoretical research always aimed at fulfilling the freedom, development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laborers represented by the proletariat, which was Marx's "consistent" goal. In his youth, middle age and even old age, he maintained his lifelong goal of research, and never showed a sign of radical "diversion", "transfer" or "interruption". Thus there was not such a "return" to his earlier thinking as some scholars have alleged. Marx made anthropological notes and related studies in his later years, not because of his "archaeological" interest, or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n anthropology different from its predecessors. He made his studies, not simply for the exploration of such a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 as the Russian road, or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stead, he was trying to improve, develop and deepen his understanding of such an epoch issue and an epoch task a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ll mankind, and to find out a fundamental method and realistic route for the solution to such an epoch issue and the fulfillment of such an epoch task,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society and the early human life and practice.

Key words: Karl Marx in his later years, anthropological notes, ideological theme,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ll mankind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8 页。